

第二波现代化之“帝国的共鸣”

——1848年欧洲变革的案例研究和定性比较分析*

叶成城

内容提要:1848年欧洲变革是19世纪欧洲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最重要的特征是国家之间存在远高于前几个世纪的互动与社会共鸣。除了英国和俄国等少数国家,欧洲大部分国家都在短时间内爆发了社会变革,并且基本都以失败告终。本文结合阶级分析方法和现代化理论,采用定性比较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讨论1848年欧洲各国政治现代化的成败原因。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危机是政治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它作为外部冲击触发了各国内部的变革诉求。在此基础上,1848年的现代化浪潮存在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具有较高经济水平且不受反革命联盟影响的国家,它们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来推动政治现代化;第二条路径是具有强国家能力且利益固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它们通过君主立宪制改良来推动现代化进程。此外,通过过程追踪和更长时段的分析可以发现,同时具备上述两条路径所需因素组合的国家,其转型的代价更低且转型后建立的制度也更为稳定。

关键词:1848年欧洲变革 社会共鸣 阶级斗争 君主立宪 政治现代化

一 引言

地理大发现以来的300年间,西欧开启了近代史上第一波现代化浪潮。^①英国率先实现现代化后,法国等欧陆国家在18世纪中期开始效仿英国成功经验进行变革,一

* 本文获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基金项目“社会科学中的空间理论评析”的资助。感谢唐世平、黄振乾、郝诗楠等学者的有益讨论,同时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① 早期的现代化研究参见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载《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第42-69页;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5, No.3, 2005, pp.546-579;叶成城、唐世平:《第一波现代化:一个“因素+机制”的新解释》,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第119-137页。

系列失败的改革引发了影响深远的大革命。^① 1799年年底的雾月政变拉开了法兰西帝国对外扩张的序幕,在此之后,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领导下的法国横扫了欧洲的旧制度,将象征着大革命成果的政治法律制度迅速扩散到欧洲各地,加速了欧洲的现代化进程。拿破仑战争强制推进了拿破仑的司法体系,废除了现存的法律,传播了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② 如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所言,滑铁卢战役过后,旧欧洲重新填补了因拿破仑消失所带来的长时期的莫大空虚,然而波拿巴的阴灵仍然震撼着旧世界,革命的力量时刻让各国君主惴惴不安。^③ 在此之后,19世纪20-30年代欧洲的抗争进一步推动了民众思想的现代化,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复辟的旧制度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和民众的权利诉求。如表1所示,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深受拿破仑帝国及其早期抗争的影响,而在1848年,多数出现抗争与变革的国家都深受这些关键先期条件的影响。^④ 19世纪20-30年代的革命不断冲击以“三皇同盟”为代表的欧洲保守势力,最终在1848年形成更大规模、席卷欧洲的变革浪潮,彻底终结了旧世界。

欧洲各国的抗争与变革在1848年集中出现,引发了19世纪最为剧烈的现代化浪潮。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1848年变革是第一次潜在意义上的全球革命,是欧洲唯一一场传播最广却也最不成功的革命,并对此后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彻底清除了中世纪以来的农奴制残余,增强了欧洲民众的权利意识;另一方面,它也唤醒了各国的民族意识,由此引发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因民族问题而出现的分裂、统一与战争。^⑤ 这场变革以极快的速度爆发,并且除了少数国家成功之外,多数国家在较短时间内以失败而告终。因此,许多学者将1848年变革称为“欧洲之春”,也时常由于特征的相似性被当代社科学者用于类比“阿拉伯之春”。^⑥ 本文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1848年欧洲变革的案例比较研究,了解区域内的急

^① 本文将1789-1848年前后定义为第二波现代化时期,划分的理由是出现了强烈的传播效应,国家开始通过强制、诱导等互动模式影响周边国家的现代化。与此同时,现代化开始从欧洲传播到世界各地。而1848年至1945年前后则可以定义为第二波半现代化,相关讨论可参见王子夔:《现代化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从“类型”到“分波次”》,载《学术月刊》,2018年第3期,第177-184页;叶成城、唐世平:《超越“大分流”的现代化比较研究:时空视角下的历史、方法与理论》,载《学术月刊》,2021年第5期,第77-86页。

^② Michael Broers, “Pride and Prejudice: The Napoleonic Empire through the Eyes of Its Rulers,” in Ute Planert, ed., *Napoleon's Empire: European Politics in Global Perspective*,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310-311.

^③ 参见[法]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李丹、方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49页。

^④ 关于关键先期条件的概念,参见 Dan Slater and Erica Simmons, “Informative Regress: Critical Antecedent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3, No.7, 2010, pp.886-917.

^⑤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张晓华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⑥ Kurt Weyland, “The Arab Spring: Why the Surprising Similarities with the Revolutionary Wave of 1848?”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10, No.4, 2012, pp.917-934; [美]理查德·埃文斯:《竞逐权力:1815-1914》,胡利平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215-239页。

剧社会变化对国家的影响,以及探讨是哪些因素和机制导致了各国制度变革结果的差异。

表 1 1848 年变革的关键先期条件

国 家	拿破仑的影响	1820-1830 年代抗争	1848 年抗争
法国	1	1	1
丹麦	1	1	1
意大利诸邦	1	1	1
德意志小国	1	1	1
尼德兰	1	1	1
奥地利/普鲁士	1	0	1
瑞士	1	1	1
波兰	1	1	0
西班牙/葡萄牙	1	1	0
挪威—瑞典联合王国	1	0	0
俄罗斯	0	0	0

资料来源:Ute Planert, ed., *Napoleon's Empire: European Politics in Global Perspective*, Chapter 1; Seva Gunitsky, "Democratic Wav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16, No.3, 2018, p.638; Mike Rapport, *1848: Year of Revolution*, Basic Books, 2008, Chapter 2-3。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讨论了前人关于 1848 年变革的各类理论及其在解释具体国家案例上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理论框架;第三部分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对欧洲 20 多个国家的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导致 1848 年欧洲国家成功推动政治现代化的因素组合;第四部分在给出因素组合的基础上,通过过程追踪来检验具体的因果路径和机制,查看社会变革中两种不同的因果路径;第五部分是结合定性比较分析和过程追踪总结 1848 年欧洲各国不同的现代化模式长期可能存在的缺陷,并讨论其变革对于此后欧洲历史的深远影响。

二 文献梳理与理论框架

关于 1848 年欧洲变革的文献较多,观点也各有差异,但这些文献几乎都认识到

1848年前后大规模政治社会变革在时空上的密集性,尝试从各自的视角解释和分析为何这一变革在时间上集中爆发,在空间上又覆盖了欧洲地区的多数国家。诸多政治学和历史学的文献对此进行了讨论,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五类理论。

(一)经济基础理论

这类理论强调的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影响。恩格斯将1848年革命视为阶级斗争的结果,工业革命使各阶级间关系明朗化,形成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①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通过对法国的观察发现,在关键的动员问题上,有组织的工人的地位变化影响了民主化的轨迹,工人组织在1848年开始大量增长,并且涌进国民警卫队中,最终通过布尔乔亚—工人—农民的联合推翻了奥尔良政权。^②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讨论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第一波民主化浪潮”时,主要将其归因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认为经济发展、工业化、都市化、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出现、工人阶级的发展等因素都在北欧国家民主化运动中发挥了作用。^③这类理论的优势在于解释了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如法国和德国地区)工人运动的根源,但如果把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全部归因于阶级斗争,则无法解释工业化程度较低的东欧国家为何也爆发了同样的抗争,但同时工业更为发达的荷兰和英国却相对平静。

(二)观念变革理论

该理论侧重于讨论民众社会观念的变化对1848年欧洲变革的影响,认为欧洲革命的主要动力源于自由民主观念的普及。托克维尔在解释1848年法国革命时提到了工业革命后民众观念的转变,即工人对民主的向往深入人心,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理论开始获得普通民众的认可。这些理论试图证明人类所有的悲剧都是法律带来的,通过改变社会现状可以改变当前的贫困。^④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认为,美国的民主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对欧洲革命产生了影响。美国开创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和形式,1847—1848年的瑞士革命是欧洲历史上最接近美国革命和宪法的案例,给欧洲带来了至关重要的新活力。^⑤社会观念的变化较好地解释了制度变迁的起点,但是无法单独解释那些在1848年前后没有任何变化的社会(如西班牙和葡萄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5页。

^② Charles Tilly, *Contention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1650–20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21–122.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7页。

^④ 参见[法]托克维尔:《1848年法国革命回忆录》,李秀峰等译,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85–86页。

^⑤ Jonathan Israel, *The Expanding Blaze: How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gnited the World, 1775–1848*,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547–567.

(三)人口压力理论

这类理论讨论的是“马尔萨斯陷阱”及其带来的经济危机对欧洲革命的影响。历史学者迈克·拉波特(Mike Reapport)将1848年保守秩序的崩塌归因于欧洲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现代化”危机:欧洲农村地区已经濒临“马尔萨斯陷阱”,城市建设的速度赶不上乡村贫民涌入的速度,同时周期性的经济萧条遇上马铃薯病造成的粮食绝收,引发了普遍的愤怒和骚乱。^①同样有学者认为,这场变革是短期经济波动的结果,即1845-1847年的严重粮食供应短缺及随后的工业衰退引发了恐慌,由此导致了1848年的革命。^②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进一步用人口/社会结构模型来解释1848年前后的危机,提出人口压力带来的劳动力过剩、城市人口激增、实际工资下降和谋求精英职位的受教育者不断增加,造成中下层精英的普遍不满。他认为,1848年革命并非必然的突破性进展而是周期性危机的再次回归。^③这类理论的优势在于较好地解释了为何1848年欧洲革命具有普遍性,而缺陷则在于无法解释国家层面(如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差异,甚至也很难解释历史学家所提到的1780-1840年间法国人口出生率一直在降低的问题——这结束了法国作为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历史,但法国却是1848年欧洲革命风暴的中心。^④

(四)社会认知理论

社会认知理论将1848年革命视作非理性抗争的结果。库尔特·维兰德(Kurt Weyland)从有限理性和认知的角度讨论了1848年革命。他认为,如果没有发展完善的政治组织,暴乱和自发起义将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因为公民获取信息的渠道会受到限制,从而无法正确地看待各类事件和选择。^⑤当周边国家发生剧变时,他们却缺乏能力和经验来判断这些事件是否有可能在自己的国家取得成功。1848年的行动者做出了轻率、过于乐观的决定,倾向于认为革命很容易像法国一样迅速获得胜利,因此在奋起反抗时低估了斗争的残酷性。^⑥相比之下,在1848年革命中,反动势力由于长期执政而更具经验,在革命浪潮之后通过总结和学习,能够更彻底地处理信息和进

^① Mike Reapport, *1848: Year of Revolution*, pp.32-37.

^② Helge Berger and Mark Spoerer, "Economic Crises and the European Revolutions of 1848,"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61, No.2, 2001, pp.293-326.

^③ [美]杰克·戈德斯通:《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章延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4-335页。

^④ 参见[美]威廉·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王晋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05页。

^⑤ Kurt Weyland, *Making Waves: Democratic Contention i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Since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⑥ Kurt Weyland, "The Arab Spring: Why the Surprising Similarities with the Revolutionary Wave of 1848?" pp. 917-934.

行比较理性的决策,因此可以制定有效措施以扼杀革命。^① 维兰德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关于欧洲革命迅速兴起和失败的微观思考,但是他的理论很难解释为何一些“仓促发动”抗争的国家(如丹麦)仍然取得了成功。

(五)效仿和扩散理论

该理论则侧重于认为 1848 年的革命和反革命是特定案例(主要认为是法国)在欧洲整体扩散的结果。塞瓦·冈蒂斯基(Seva Gunitsky)通过对北美独立战争以来 13 次民主化潮流的类型学分析,认为 1848 年革命属于一种“横向跨界传播”(horizontal cross-border contagion)的社会革命,即通过共享的水平网络和区域效应展开而较少受到国际秩序的影响,并且抗争的蔓延压倒了国内的影响,因此与内部原因无关。^② 另有一些学者通过大样本研究和案例分析认为 1848 年革命传播之后,保守派(reactionaries)对于前车之鉴的学习更多的是基于相似而非相差较大的政体类型,例如普鲁士更多的是类比奥地利而非法国来制定其长期的反革命模式。^③ 这类理论的优势在于能够较好地解释为何抗争会集中爆发以及失败的原因,但仅仅将其归因于法国革命的扩散仍然无法解释为何巴登等德国地区进行抗争的时间要早于法国,当然它也无法解释法国的案例。

如表 2 所示,虽然各类理论都有各自的解释力,但是上述理论同样有许多无法解释的案例。例如强调外部情境要素的理论很难解释国家间的差异,而强调特定国内要素的理论同样会因为现代化的浪潮而出现无法解释的案例,甚至简单多变量组合也无法解释全部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过程。亨廷顿认为,没有一个单一因素足以解释在所有国家中的民主发展,也没有单一因素对所有国家的民主发展必不可少,每一个国家的民主化都是各种原因结合的结果,这些产生民主的原因由于国家不同而异。^④ 因此本文做出如下猜想:1848 年欧洲的现代化浪潮很可能存在“多重因果性”^⑤,即存在成功推动政治现代化的多条不同路径,而这些路径的发现和检验则需要通过混合方法,用实证研究来寻找相关的因素与机制。

^① Kurt Weyland, “Crafting Counterrevolution: How Reactionaries Learned to Combat Change in 1848,”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10, No.2, 2016, pp.215-231.

^② Seva Gunitsky, “Democratic Wav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p.634-651.

^③ Edward Goldring and Sheena Chestnut Greitens, “Rethinking Democratic Diffusion: Bringing Regime Type Back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53, No.2, 2020, p.342.

^④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 46-47 页。

^⑤ 关于多重因果性的讨论,参见 Charles Ragin,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表2 关于1848年欧洲变革的各类理论及其缺陷

理论	难以解释的案例
经济基础理论	奥地利、意大利
观念变革理论	西班牙、葡萄牙
人口压力理论	普鲁士、奥地利、法国
社会认知理论	荷兰、比利时、丹麦
效仿和扩散理论	巴登、巴伐利亚、法国

注：表由作者自制。

在进行实证研究之前,需要进一步查看1848年前后欧洲国家制度变迁的具体时空情境,即这一时期内哪些特征差异使得欧洲国家制度变迁的路径或机制不同于18世纪或更早期的欧洲。具体而言,它存在两个方面的鲜明时代特征:其一,国际社会中的进步与保守力量开始逐渐影响到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变迁,这是法国大革命之前从未有过的现象。英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组成的四国同盟是维也纳秩序的基础。一方面,保守力量在奥地利首相克莱门斯·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的“协调”下组成了专制国家的反革命联盟,并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19世纪20-30年代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民主化潮流;另一方面,英国和美国的民主力量迅速崛起,后者主要提供了制度的模板,而前者则同时提供了部分物质力量的支持,例如英国在其他国家的民主化问题上几乎处处与梅特涅的意见相左。其二,交通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带来社会层面的飞跃。交通的发展尤其是铁路的普及“缩短”了整体欧洲内部的距离,使得欧洲内部人员之间的交流更为频繁和便利:1830-1847年奥地利增加了3万英里以上的公路,比利时的公路也增加了一倍,法国则在1800-1847年间开挖了2000英里的运河,各国都开始在19世纪20-30年代修造铁路,从而大大提高了陆路运输人员、货物的速度和数量。^①电报的出现则大幅缩短了欧洲内部的信息交流时间,它与铁路的发展相辅相成。电报网沿着铁路线发展,到1848年,半数铁路公司拥有自己的电报系统。^②具体而言,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分别于1832年、1835年和1839年开始使用这些通信系统,1837年美国获得电磁电报专利,英国率先在1846年成立电报公司。新通信手段的诞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1848年爆发的革命浪潮提供了不可或缺

^①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辉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53-54页、195-196页。

^② [英]H.J.哈巴库克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王春法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页。

的通信基础,尤其为各国同时爆发革命创造了条件。^① 这些频繁的交流仍然需要必要的经济(尤其是工业化)水平作为基础。例如,铁路的发展需要冶金等行业的工业基础,一些经济基础较为落后的国家(如葡萄牙、俄罗斯、挪威和瑞典),每平方公里的铁路里程仍然少于0.01公里,这一数字远远低于英法等国。^② 而经济水平的提升也带来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不断壮大,使得前者最后成为1848年欧洲变革的主要力量。1847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详细的理论和实践党纲,《共产党宣言》于法国二月革命前几周在伦敦面世。^③ 从这个革命之年开始,工人阶级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些群体主要存在于人口密度高的工业化地区,包括比利时部分地区、法国北部、里昂周围地区、意大利北部、萨克森、鲁尔地区 and 柏林、波希米亚和上西里西亚。^④

在此背景之下,19世纪出现的第二波现代化同此前第一波现代化浪潮最大的差异在于,欧洲各国无论在结构层面(国家与国际秩序之间)还是在过程层面(民众与民众之间),都有着远胜于过去的频繁互动。国际政治中具体政策扩散的机制有许多类型,例如包括强制、学习和效仿(emulation)等。强制即由强大的国际组织或国家将政策强加给他国,学习是从其他国家经验中获得关于结果的有用信息,效仿则主要指规范的传播。^⑤ 早期的扩散理论往往试图强调特定要素扩散对于制度变迁的影响,而事实上1848年欧洲的这种扩散是多方面、多维度的,并非简单的学习或强制机制,本文称这种复杂的机制为“共鸣”(resonance)。当外部冲击出现后,旧世界下的各帝国在彼此之间迅速产生共鸣,它主要包含了三方面的互动。其一,国家在结构层面的互动,主要包括国际性的支援与强制,即强国可以通过对他国斗争中一方的援助来改变制度变迁的方向。1848年变革更多的是以神圣同盟为代表的保守力量对于欧洲国家抗争的扼杀,而英美等民主国家对欧洲国家政治现代化所进行的干预则极其有限。其二,国家层面的观念性影响,主要指国家可以通过自身的示范效应来诱导他国学习自身的制度,例如法国和瑞士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制度的影响,而在德国关税同盟地区,比

① 参见[美]理查德·埃文斯:《竞逐权力:1815-1914》,第199-200页。

② 由于缺乏1848年前后的数据,遂参考了1870年的铁路数据,显然1848年前后这一数值更低。[英]彼得·马赛厄斯、悉尼·波拉德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八卷)》,王宏伟、钟和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7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6-377页。

④ Reinhart Koselleck, “How European Was the Revolution of 1848/49?” in Axel Körner, ed., *1848—A European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Ideas and National Memories of 1848*,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pp.209-211.

⑤ Fabrizio Gilardi, “Transnational Diffusion: Norms, Ideas, and Policies,”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AGE Press, 2013, pp.460-469.

利时的宪法发挥了模范作用。^①其三,个体层面的影响,行动者会受到国外思想或者斗争胜利经验的鼓舞,而交通通信改善带来的国家之间的人员密切往来以及各国革命信息的传播,都会增强民众的变革偏好。^②总体而言,强烈的互动与共鸣成为1848年欧洲变革的重要时空情境,使得这个时空内的欧洲国家的制度变迁逻辑不同于更早或更晚的欧洲以及同一时期的其他地区。

在进行具体的实证分析之前,需要对案例和研究方法进行如下说明。首先,本文讨论的时空范围限定在1848年前后两三年间的欧洲非民主国家,而拉美和亚洲等地区由于时空情境的巨大差异并不在讨论范围内。^③其次,由于英国的民主化在光荣革命后几乎没有倒退,19世纪英国的民主化更多是普选权普及等问题,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制度性变革,因此对英国也不做讨论。最后,在中等样本中,讨论可能存在多重路径,最好的办法仍然是采用QCA和过程追踪相结合的混合方法,前者用于跨案例的数据集观察值对多个路径进行分析,而后者则通过过程追踪进一步寻找因果过程观察值来检验相关的因果路径。^④

三 1848年欧洲变革的定性比较分析

由于案例研究的时空范围限定在1848年前后的欧洲,符合条件的独立欧洲国家有近20个,这个样本数量属于典型的“中等样本”,其数量较多以至于无法一一进行案例研究,而样本数又不足以进行回归分析,故而最适合用定性比较分析。这一方法最初由查尔斯·拉金(Charles Ragin)所倡导,其优势在于能够在多变量互动的中等样

^① Jonathan Israel, *The Expanding Blaze: How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gnited the World, 1775-1848*; Reinhart Koselleck, “How European Was the Revolution of 1848/49?” p.211.

^② 参见 Kurt Weyland, “The Diffusion of Revolution: ‘1848’ i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3, No.3, 2009, pp.391-423.

^③ 关于时空情境的讨论,参见叶成城、黄振乾、唐世平:《社会科学中的时空和案例选择》,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3期,第145-155页。

^④ 混合方法原理的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具体方法讨论参见 James Mahoney, “After KKV: The New Methodolog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World Politics*, Vol.62, No.1, 2010, pp.120-147; Carsten Q. Schneider and Ingo Rohlfing, “Case Studies Nested in Fuzzy-Set QCA on Sufficiency: Formalizing Case Selection and Causal Inference,”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Vol.45, No.3, 2016, pp.526-568; Derek Beach, “Achieving Methodological Alignment When Combining QCA and Process Tracing in Practice,”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Vol.47, No.1, 2018, pp.64-99.

本中,通过计算软件获得解释结果变量的因素组合。^① 本文选取以下变量来考察它们对 1848 年前后欧洲政治现代化的影响,一方面借鉴了 19 世纪之前(16-18 世纪)欧洲现代化历程中的重要解释变量,分别是利益固化、国家能力、经济危机;另一方面也借鉴了 20 世纪现代化理论中几个重要的解释变量,包括经济水平、经济增长程度和贸易自由度。此外,反革命联盟是 19 世纪梅特涅所倡导的国际体系中的重要特征。

(一)变量选择与赋值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政治现代化。^② 该变量主要考察国家的现代化改革是否有所推进,由于一些数据库缺乏 1900 年之前的政体数据库,遂采用“政体 IV:政权权威特征和过渡数据集”(Polity IV: Regime Authority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 Datasets)。^③ 本文主要用“Polity IV”的变化来测量 1848 年前后三年(1845-1851 年)除英国外的欧洲国家是否成功推进了政治现代化:如果政体分数上升 3 分以上,则将被解释变量编码为 1,反之则编码为 0。^④

解释变量 1:利益固化,即考察国家是否存在强有力的利益集团从而为内部的制度变革带来巨大的阻力。制度经济学派的利益集团理论认为,拥有权力的一方通过武力威胁或者使用权力就能够得到更高的收益,通过形成排他性的分利集团来阻碍变革并降低社会效益。^⑤ 只有在没有强大的分利集团、国家权力较为集中的情况下,国家与社会利益才具有相容性,实施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发展政策。^⑥ 同时,当内部缺乏统一的利益集团时,精英内部分裂也可以推动国家民主化的转型。^⑦ 本文通过考察旧贵

^① 关于 QCA 方法的思想,参见拉金的“三部曲”:Charles Ragi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7; Charles Ragin, *Fuzzy-Set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Charles Ragin,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国内也有学者用类似的 QCA 方法研究欧洲的国家兴衰或制度变迁,参见唐睿、唐世平:《历史遗产与原苏东国家的民主转型——基于 26 个国家的模糊集与多值 QCA 的双重检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2 期,第 39-57 页;黄振乾、唐世平:《现代化的“入场券”——现代欧洲国家崛起的定性比较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18 年第 12 期,第 26-41 页。

^② QCA 的逻辑不同于回归分析,不存在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相关关系,因此不用自变量和因变量来进行描述。参见刘丰:《定性比较分析与国际关系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1 期,第 108 页。

^③ 政体数据来自 Integrated Network for Societal Conflict Research (INSCR), <https://www.systemicpeace.org/inscrdata.html>。

^④ 1848 年之前,欧洲只有英国实施代议制民主制,属于特殊案例,因此将英国排除在分析的样本之外。本文之所以用 3 分作为一个阈值和门槛,主要原因在于,这是政体分数提升的中位数,在 1848 年的情境下,提升为 3 分国家是政治进步的重要门槛,大体是减少专制君主的管制,出现了君主立宪和组阁,这相当于同前现代的旧制度决裂,将国家视为公器而非王室私产,也体现了 1848 年欧洲变革作为现代化的转折点和里程碑的意义。

^⑤ [美]曼瑟尔·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稽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8-50 页;[美]曼瑟尔·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李增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1-74 页。

^⑥ 刘晨:《利益集团、权力结构与发展政策——对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6 期,第 130 页。

^⑦ Ben Ansell and David Samuels, *Inequality and Democratization: An Elite-Competition Approa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族是否足够强大和团结,以至于能够控制整体国家机器,形成强力的分利集团。如果利益固化程度高,编码为1,如果利益固化程度低,编码为0。^①

解释变量2:国家能力,即考察国家是否具有较强的国家能力来推动与实施现代化改革。在关于其他地区的现代化研究中,已经有学者提出了强国家的重要性,例如早期一些学者对东亚发展型国家或东南亚国家民主化转型的研究。^② 本文用战争关联者项目(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数据库所提供的1848年欧洲的国家能力综合指标(Composite Indicator of National Capability, CINC)来对欧洲国家的国家能力进行编码。CINC衡量的是国家物质能力,包含所有成员国的总人口、城市人口、钢铁产量、能源消耗、军事人员和军费这6个指标。^③ 本文将1848年的CINC得分高于中位数0.012的国家(恰好是介于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国家——荷兰作为分界线)编码为1,低于0.01的国家编码为0。

解释变量3:经济水平,即考察欧洲国家的人均GDP水平。西摩·利普塞特(Seymour Lipset)、大卫·爱泼斯坦(David Epstein)等人通过定量分析发现,民主化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性关系。^④ 二战后的经验也表明,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有助于国家的民主化转型。^⑤ 本文用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对1850年欧洲各国的人均GDP的估计值来考察欧洲国家的初始经济水平高低。^⑥ 由于麦迪逊的数据仅仅估计德意志和意大利地区的均值,这些地区一些小国的数据则参照了丹尼尔·齐勃拉特(Daniel Ziblatt)的研究。^⑦ 如果高于欧洲的中位数则将其编码为1,反之则编码为0。^⑧

① 这部分赋值主要参照和借鉴大英百科全书网络版, <https://www.britannica.com/>;同时,一些历史细节问题也参考了东方出版中心翻译的《世界历史文库》系列丛书,鉴于数量众多不再一一罗列。

② 例如 Meredith Woo-Cumings,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Tuong Vu, *Paths to Development in Asia: South Korea, Vietnam, China, and Indone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Dan Slater, "Southeast Asia: Strong-State Democratization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3, No. 2, 2012, pp.19-33。

③ 国家能力的数据来源自 <https://correlatesofwar.org/data-sets/national-material-capabilities>。

④ 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3, No.1, 1959, pp.69-105; David Epstein et al.,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0, No.3, 2006, pp.551-569。

⑤ Carles Boix and Susan C. Stokes, "Endogenous Democratization," *World Politics*, Vol.55, No.4, 2003, pp. 517-549。

⑥ 受到数据的限制,1870年前许多欧洲国家都只有间隔十年的数据,并且相差2年对这一估值的排名影响微乎其微。初始经济水平的数据来自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ECD, Development Center, 2006, pp.436-447。

⑦ Daniel Ziblatt, *Structuring the State: The Formation of Italy and Germany and the Puzzle of Feder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apter 3-4。

⑧ 由于估值本身存在误差,而人均GDP排名居中的国家与欧洲29国的均值非常接近,因此本文用中位数而非均值来作为赋值的标准。

解释变量 4:经济增长速度,即考察欧洲国家的人均 GDP 年均复合增长率。有学者的长时段研究表明,缓慢或者负增长容易引起国家内部的崩溃。^① 本文用此变量来观察经济较高或者较低增长是否会对制度变化产生影响。受到数据的限制,早期欧洲仅有 1820-1870 年间的经济增长平均估值,本文将增长率高于西欧国家平均增长率 0.98% 的国家视为高增长率国家,编码为 1,反之则编码为 0。^②

解释变量 5:贸易自由化,主要考察欧洲国家贸易自由化的程度。贸易同样是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在第一波现代化过程中,西欧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西洋贸易带来的冲击和分配效应的影响;而关于 19 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国际贸易可能有助于推动国家的民主化进程。^③ 本文主要用两个指标衡量当时的贸易自由化程度,第一个指标为是否允许工业制成品进口,第二个指标为关税水平是否低于 25%。如果符合上述两个指标则视为贸易自由化程度高,编码为 1,反之则编码为 0。^④

解释变量 6:反革命联盟。由于在 1815-1848 年间,欧洲曾经出现了由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组成的以反革命为目标的“四国同盟”或称之为“神圣同盟”。此后,英国由于奥地利过于保守的立场而退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进步力量的支持。因此,本文将俄罗斯以及它所控制的地区(如芬兰)、普鲁士及深受其影响的德意志地区(萨克森、巴伐利亚和巴登)和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及其控制的北意大利地区(摩德纳、帕尔马和托斯卡纳)视为反革命联盟的范围,将其编码为 1,其他国家则编码为 0。

解释变量 7:经济危机。由于国家内部存在维持均衡的机制,因此需要强力的外部冲击打破均衡状态。其他地区的实证研究也表明,经济危机经常是改革或转型的契机。^⑤ 多数欧洲国家在 1840-1848 年间爆发了严重的经济萧条和衰退,这次衰退涉及大部分工业和农业领域。因此本文通过相关史料查阅 19 世纪 40 年代欧洲国家内部

^① Vilde Lunnan Djuve, Carl Henrik Knutsen and Tore Wig, “Patterns of Regime Breakdown Since the French Revolu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53, No.6, 2020, pp.923-958.

^② 人均 GDP 增长率的数据来自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643.

^③ Barry Eichengreen and David Leblang, “Democracy and Globalization,” *Economics & Politics*, Vol.20, No.3, 2008, pp.289-334; J. Ernesto López-Córdova and Christopher M. Meissner,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n Democracy: A Long-Run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Vol.60, No.4, 2008, pp.539-575.

^④ 25% 的关税约是德国的平均水平,在当时的贸易环境下,高于这个税率近似于禁止贸易。关于关税的数据和资料,参见[英]彼得·马赛厄斯·悉尼·波拉德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八卷)》,第 1-22 页。

^⑤ 叶成城、郝诗楠:《政治学研究中的时间性:因果机制与事件的时间状态类型》,载《复旦政治学评论》,2019 年第 2 期,第 205-236 页。关于经济危机对制度变迁的实证研究,参见 Mark Gasiorowski, “Economic Crisis and Political Regime Change: 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9, No.4, 1995, pp.882-897; Thomas Pepinsky, *Economic Crises and the Breakdown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donesia and Malay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是否存在较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如果存在将其编码为1,反之则编码为0。^①

基于上述变量和案例,本文获得变量赋值表,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赋值表

国家/变量	利益固化	国家能力	经济增长	初始经济水平	贸易自由化	反革命同盟	经济危机	政治现代化
法国	1	1	1	1	0	0	1	1
比利时	0	1	1	1	1	0	1	1
丹麦	0	1	0	1	1	0	1	1
尼德兰 (荷兰)	0	1	0	1	1	0	1	1
瑞士	0	0	1	1	1	0	1	1
奥地利	0	1	0	1	0	1	1	1
撒丁王国	0	1	0	0	1	0	1	1
希腊	0	0	0	0	1	0	0	0
巴伐利亚	1	0	1	1	1	1	1	0
摩德纳/帕尔 马/托斯卡纳	0	0	0	0	1	1	1	0
巴登	0	0	1	0	1	1	1	0
芬兰	0	0	0	0	0	1	1	0
俄罗斯	1	1	0	0	0	1	0	0
瑞典—挪威 联合王国	1	1	0	0	0	0	1	0
普鲁士	1	1	1	1	1	1	1	0
两西西里	1	1	0	0	0	0	1	0
西班牙	1	1	0	0	0	0	1	0
葡萄牙	1	0	0	0	1	0	0	0
萨克森	0	0	1	1	1	1	1	0
波兰	1	0	0	0	1	0	0	0
教皇国	1	0	0	0	1	0	1	0

注:表由作者自制。

(二) 条件组合的定性比较分析

在上述变量讨论的基础上,本文使用复旦大学复杂决策中心开发的“全功能多值

^① 关于经济危机的变量赋值,参见[英]斯蒂芬·布劳德伯利、凯文·奥罗克编著:《剑桥现代欧洲经济史:1700-1870(第一卷)》,何富彩、钟红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120页。

QCA(FM-QCA)”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①

(1) 条件组合的一致性(consistency)与覆盖率(coverage)检验

在考察变量组合对结果的影响之前,首先需要查看单个变量对结果的影响,分析软件给出了变量的一致性和覆盖率。一致性近似于回归分析中的P值,尽管没有统一标准,但通常认为一致性高于0.9时,可以近似视作“充分条件”。根据分析可知,表4所示的7个变量并不存在结果出现的充分条件,这表明没有单一变量可以解释1848年现代化改革的成败。^②覆盖率则近似于回归分析中的R²,当覆盖率高于0.9时,可以近似视作“必要条件”。根据分析可知,经济危机的覆盖率为1,是现代化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即1848年欧洲的现代化改革需要一个外部冲击作为导火索,因为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更有进行改革的动力。

表4 一致性和覆盖率检验(结果变量取值为1)

解释变量	一致性	覆盖率
利益固化	0.1	0.14
国家能力	0.55	0.86
经济增长	0.43	0.43
初始经济水平	0.67	0.86
贸易自由化	0.38	0.71
反革命同盟	0.13	0.14
经济危机	0.43	1

注:表由作者自制。

(2) 解释变量组合结果分析

QCA的作用在于提供关于解释变量组合的分析,根据FM-QCA软件的超集计算,可以获得如下的精简解。^③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在必要条件(经济危机)的基础上,有两个组合是1848年欧洲国家成功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充分条件:第一个组合是利益固

^① 该软件由复旦大学复杂决策中心唐世平教授团队开发,参见<http://www.ccda.fudan.edu.cn/uploads/2015/03/162023101175.pdf>。

^② 需要指出的是,QCA计算得出的“充分性”缺乏具体因果机制,并非因果意义上的充分条件,参见周亦奇、唐世平:《“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与机制辨别:北约与华约的命运为何不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2期,第32-59页。

^③ 由于样本量仍然偏少,所以文章在简化解的过程中用0.5的覆盖率(文中相当于3个正面案例)作为阈值,因为本身存在3个超级案例,正面案例较少会影响对路径的分析。

化程度低且具有强国家能力的国家,第二个组合是经济水平较高且不受反革命同盟影响的国家。QCA 软件在计算过程中用布尔逻辑运算将经济增长、贸易自由化这两个变量简化,这也展现了 QCA 的优势所在。如表 5 所示,这两个变量组合的一致性都为 1,而覆盖率也较高,达到 71%,故而这两个组合都为结果出现的充分条件,并且包含半数以上的正面案例,因此可以认定估计的结果较为理想。而上述两个组合包含了变量赋值表中的全部正面案例,且不存在不符合理论预期的“反例”。^① 同时通过计算可知,所有组合(solution)的覆盖率和一致性都为 1,因此估计结果可以视为“布尔代数意义上”的现代化改革成功的“充分必要条件”。^② 最终结果可以表达为“政治现代化改革成功=经济危机*”(利益固化程度低*国家能力强+初始经济水平高*不受反革命同盟影响)。^③

表 5 条件组合分析结果(结果变量取值为 1)

条件组合	正面案例	一致性	覆盖率
经济危机*利益固化程度低*国家能力强	奥地利、撒丁王国、比利时、丹麦、荷兰	1	0.71
经济危机*初始经济水平高*不受反革命同盟影响	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荷兰	1	0.71
所有组合的覆盖率(solution coverage)			1
所有组合的一致性(solution consistency)			1

注:表由作者自制。

(3)QCA 分析结果的意义

单单寻找两个导致结果出现的组合仍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同时查看这些组合所蕴含的因果解释意义,从而有助于寻找和检验不同路径下可能存在的因果机制。首先,经济危机作为一个大前提,可能是 1848 年变革的外部冲击,即欧洲国家内部由于经济危机而引发了系统效应,包括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君主国为避免政权崩溃而进行的预防性改良措施。其次,第一条路径(经济危机*利益固化程度低*国家能力强→政治现

^① Fm-QCA 软件中关于正案例和负案例的表述不够准确,具体的概念区分参见 James Mahoney and Gary Goertz, “The Possibility Principle: Choosing Negative Case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8, No.4, 2004, pp.653-669;叶成城、唐世平:《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10 期,第 22-47 页。

^② 从机制的角度来理解因果时,单一因素组合是无法构成因果意义上的充分性的。

^③ “+”代表“或者”,而“*”代表“并且”。

代化)表明,1848年的变革与过去此前现代化的动力存在相似性,即在外部冲击之下,只有那些具有强国家能力而内部利益集团较弱的国家,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动现代化进程,例如比利时、丹麦、荷兰、奥地利和撒丁王国。^①再次,第二条路径则展现了第二波现代化中出现的新机制,即那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在不受到外部干扰时,也有可能成功推动现代化改革,包括法国、比利时、丹麦、荷兰和瑞士。可能的原因是,上述国家虽然缺乏足够强的国家能力(如瑞士)或者有较强的利益集团(如法国),但是在整个欧洲现代化浪潮的“共鸣”之下,仍然有成功的可能性,而前提是内部的现代化进程不被外国保守势力干预。文章将在后面部分通过过程追踪来进一步检验上述理论和探寻相关因果机制。

四 1848年欧洲变革的因果路径与案例分析

1848年欧洲变革既是政治事件,又是一个社会过程。单单QCA分析所得出的组合的因果解释力仍然是不足的,^②尤其是它无法区分变量在因果解释中的“层次”(例如是解释变量还是中间变量),要探讨具体事件的原因与影响,不能仅仅基于讨论因素组合,还需要回到历史情境中去考察具体的过程与机制。

1847-1848年欧洲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无论是广度、深度还是其所导致的政治分歧,都是这一时期具有最大破坏性影响的金融危机。^③具体而言,马铃薯疾病和气候问题导致了除俄罗斯和波兰之外的多数地区的粮食歉收,粮食价格上涨近50%;因食品进口而导致了大量的黄金外流、利率上升,以及英国的资本回流,这些通缩效应进一步加深了欧陆的危机。^④除了工业化程度较低的俄罗斯、波兰、希腊等少数地区相对平静,几乎所有欧陆国家都面临严重危机。始于1845年的严重经济危机极大程度地加剧了人口增长和工业化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叠加的政治危机和金融危机增加了民众对英国现代化模式的渴望,从而导致了民众对旧世界不满的再度爆发。在此背景下,由于存在多条路径(见图1)且案例数量众多以及篇幅限制,本文主要通过几个典型的“路径案例”进行过程追踪,以查看前文所给出的因素组合在1848年欧洲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根据前文QCA所给出的这两种路径,以及影

^① 叶成城:《第一波半现代化之“帝国的胎动”——18世纪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崛起之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5期,第126-15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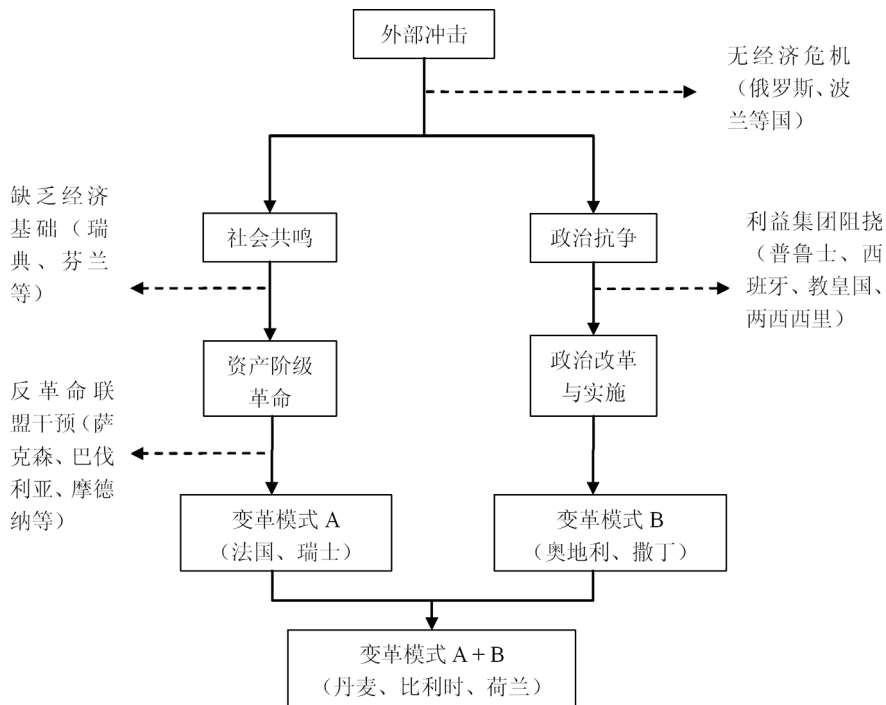
^② 对于QCA方法最新的一些批评,参见Kevin A. Clarke,“Logical Constraints: The Limitations of QCA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Political Analysis*, <https://doi.org/10.1017/pan.2020.7>。

^③ [英]彼得·马赛厄斯、悉尼·波拉德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八卷)》,第116-120页。

^④ Roger Price,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Palgrave Macmillan, 1988, pp.17-19.

响这两种路径的四个核心变量的类型学差异(见表6),选取了4个正面案例,分别是瑞士、法国、奥地利和丹麦。^①

图1 1848年欧洲变革的路径与机制图



注:图由作者自制。虚线表示阻碍具体机制的原因及案例。

表6 正面案例的类型学分析

	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		不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	
	利益固化程度低	利益固化程度高	利益固化程度低	利益固化程度高
国家能力强	丹麦、比利时、荷兰	法国	奥地利、撒丁	
国家能力弱	瑞士			

注:表由作者自制。

^① 较强的经济基础和不存在反革命联盟的干扰约等于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因此用是否出现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来简化相关的逻辑分析。

(一) 变革模式 A: 瑞士与法国

1830年的七月革命废黜了法兰西国王查理十世(Charles X),激发了瑞士的民主运动,许多州都建立了代议制政府,实行出版、贸易和工业自由。启蒙运动的理想随着“赫尔维蒂主义”(Helvetism)的意识形态在瑞士境内大为盛行,开明的瑞士人开始积极寻求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想,赫尔维蒂社团的目标是将进步力量联合起来反对古老的寡头秩序。得益于早期的工业化在旧联邦领土上的发展,其社会基础在于城市资产阶级和受过教育的农村精英。^① 19世纪40年代的经济低潮导致贫穷和其他社会问题,此后又刺激了第一批合作社和类工会组织的产生,而瑞士的宗教问题进一步推动了政治争议。^② 一些州成立了激进党,试图将国家带入一个更加联邦化的联盟以实现瑞士的政治现代化。它们主要集中在新教和城市地区,同时还采取了反天主教的政策,例如解散许多修道院并将土地出售给当地人。^③ 这些措施触动了信奉天主教的保守派州的利益,它们在1843年成立了独立联盟(Sonderbund)。双方维系了短暂的和平,直到瑞士邦联议会在1847年获得足够的票数宣布强行解散独立联盟。1847年秋,瑞士政府组织了一支近十万人的国家军队,并任命纪尧姆-亨利·杜福尔将军(Guillaume-Henri Dufour)作为指挥官,试图瓦解叛乱各州的邦联。当时的瑞士既缺乏强大的贵族势力也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所以其内战的激烈程度和破坏力远低于其他国家。受工业革命的影响,瑞士的政治和经济权力逐步转移回城市州,这使得联邦联盟拥有更好的武器和装备,从而在内战中占据绝对优势:在杜福尔的带领下,联邦军队赢得了两场小规模战斗,只用26天就结束了内战,而战争仅造成435人受伤、128人死亡,这甚至比在美国内战中阵亡的瑞士人还少。^④ 战争结束后,天主教保守派投降并接受了新宪法,而那些不愿接受新宪法的人也没有公开抵抗,而是希望得到国外的帮助,但是1848年2月后各国都因内部革命而无暇顾及瑞士的内战。^⑤ 取得内战胜利的各派力量将瑞士转变为具有中央政府、宪法、联邦机构和军队的新型民族国家,新国家的大多数精英都来自先前资产阶级协会网络,同时宣布了贸易自由、新闻自由和男性普选权

^① 参见[瑞士]安德烈亚斯·威默:《国家构建:聚合与崩溃》,叶江译,格致出版社2019年版,第58-59页。

^② [法]克莱夫·彻奇、[美]伦道夫·海德:《瑞士史》,周玮、郑保国译,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版,第140-141页。

^③ Ralph Weaver, *Three Weeks in November: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wiss Civil War of 1847*, Helion and Company, 2016, Chapter 2.

^④ Gregory A. Fossedal, *Direct Democracy in Switzerland*,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2, p.38.

^⑤ Michael Butler, Malcolm Pender and Joy Charney, eds., *The Making of Modern Switzerland, 1848-1998*,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pp.15-16.

等公民权利。1848年后,瑞士成为一个民主国家。^①其南北战争时常被历史学家视作1848年革命中一系列政治对抗中的第一场,也是欧洲更大、更具戏剧性变化的先兆。^②

法国的阶级矛盾在奥尔良王朝开始之初就已经存在,随着国家工业化的深入推进,法国的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同大资产阶级和传统贵族的矛盾日趋激烈。法国的贵族们在1830年革命之后仍然是一个富有和有影响力的阶层,在议会拥有超四分之一的席位,占据一半的主教位置,在保险、铁路和煤矿公司的董事会和外交使团中都占有重要地位。^③正如马克思所言:“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银行家、24万选民和他们的走卒之间分配的。这个制度经常不断地威胁和损害商业、工业、农业、航运业,即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④19世纪上半叶,法国中下层精英的数量急剧增长,但由于没有太多机会变成高层社会精英,许多下层精英成为政治反对派。^⑤改革最初的动力来自资产阶级中等级相对较低的群体和在大城市中享有选举权的人,他们认为自己的代表性不足从而导致政府推行了无益于自身经济利益的政策。1846年选举的结果让包括政权支持者在内的各种团体感到失望,因为自己被排除在公职和庇护之外,最终使其决定联合共和派,敦促扩大投票权,试图通过改变选举规则来获得权力。1847年7月,他们设法绕过了当局禁止集会的法律,联合起来发起了一场支持改革的“宴会运动”。^⑥尽管新的临时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有限的改革措施,包括成年男人的选举权和废除奴隶制等,但仍无法平息民众的愤怒。1847年11月,由于群众的不满以及共和主义思想的深入人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再度举行“宴会”,要求选举改革以实现法国所崇尚的“自由、平等、博爱”。^⑦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阻碍“宴会运动”,包括审判激进派杂志的编辑、抹黑“宴会运动”和规劝参加活动的法官和大学教授,而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在1847年12月的新一届议会开幕词中,用瑞士各州的叛乱来影射“宴会运动”,表达了极为保守的立场,最终导致奥迪·巴罗特(Odilom Barrot)等“宴会运动”的领导人下决心在1848年2月采取行动。^⑧

① 参见[瑞士]安德烈亚斯·威默:《国家构建:聚合与崩溃》,第59-60、76-77页。

② Jonathan Sperber, *The European Revolutions, 1848-185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15-116.

③ William Fortescue, *France and 1848: The End of Monarchy*, Routledge, 2005, pp.30-31.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48页。

⑤ [美]杰克·戈德斯通:《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第297页。

⑥ Roger Price,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pp.22-23.

⑦ Roger Price, *The French Second Republic: A Social Histo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p.92.

⑧ John J. Baughman, "The French Banquet Campaign of 1847-48,"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31, No. 1, 1959, pp.11-12.

法国的保守派没有吸取以往革命的教训,对于国内外局势完全不敏感,七月王朝内部改良的道路被彻底堵死。1848年1月,西西里起义的蔓延效应直接影响到意大利半岛,消息在邻国间迅速传播,并在1848年年初引发政治多米诺骨牌效应。^①这一传播效应最初并不被重视,只有托克维尔在1月29日的议会演说中警告:“尽管当时法国并不存在一些明显的混乱,但是革命早已深入人心……工人阶级迟早带来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②然而,多数议员都认为他在危言耸听。2月21日晚,巴罗特领导的反对派决定在巴黎最为繁华的香榭丽舍大街举行“宴会”,尽管温和派试图取消活动,但在共和派左翼的坚持下仍然如期举行。激进的学生们开始收集武器准备战斗,他们高唱《马赛曲》点燃了当时的气氛。^③游行队伍涌向众议院要求改革,与保守的市政卫队对峙,最终升级为暴力冲突,巴黎街头再度像1830年一样堆起了街垒,王室在军事上仍然看似占据优势:国王拥有3.1万人的正规军和从郊区赶来的8.5万的国民卫队,国王认为国民卫队是一支可以信赖的力量。^④然而,国民警卫队的成员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他们明确表示支持改革,因为自己与一个似乎只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格格不入。^⑤没有人愿意为失去民心的国王效力,一些激进的军团在听取工人阶级的诉求后,反而加入革命队伍,巴黎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很快在1848年2月组成了军队。^⑥最终国王宣布退位,作为王权象征的王座也被拿到巴士底广场烧毁。而法国长期的中央集权传统则加速了二月革命的胜利,因为控制了巴黎就几乎控制了全法国。

与拿破仑时期对外传播革命不同的是,由于担心国际战争会导致国内激进化,法国临时政府的实际首脑阿尔封斯·德·拉马丁(Alphonse Marie Louis de Lamartine)致信各国大使,表明法国无意改变国际现状,强调君主制和共和制并不存在绝对的意识形态冲突。^⑦拉马丁谨慎的外交政策为巩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根基赢得了时间,避免了拿破仑时期受到欧洲列强围剿的厄运。尽管俄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在得知奥尔良王朝的倒台后,对法国充满了敌意,据称他冲入宫殿宴会厅说道:“先生们,赶快上马吧,法国已经建立了共和国!”^⑧但是在三月之后,意大利和德国范围内此起彼伏的革命已经让三皇同盟无暇顾及法国的形势,在1848年12月拿破仑三世高票当选

① Kurt Weyland, “The Diffusion of Revolution: ‘1848’ i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pp.410-411.

② [法]托克维尔:《1848年法国革命回忆录》,第16-20页。

③ Priscilla Robertson, *Revolutions of 1848: A Social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29-30.

④ Mike Rapport, *1848: Year of Revolution*, pp.50-56.

⑤ Roger Price,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p.35.

⑥ Roger Price, *The French Second Republic: A Social History*, pp.90-92.

⑦ Lewis Namier, *1848: The Revolu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Anchor Books, 1964, pp.41-43.

⑧ David Saunders, *Russia in the Age of Reaction and Reform 1801-1881*, Routledge, 2014, p.190.

总统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暂时避免了迅速崩溃的结局。

(二)变革模式 B:奥地利

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奥地利凭借其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在欧洲各大金融市场建立了信用,此后长时期的和平进一步增加了梅特涅政府的信誉。梅特涅政府依靠高超的政治手腕形成了对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制,因此,奥地利没有出现普鲁士那样强大到足以控制中央政府的利益集团,这也为其短暂的强国家时期奠定了基础。根据恩格斯的观察,银行家、证券投机商、政府承包商虽然总是设法从专制君主制那里获得大宗利润,但这是以政府对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几乎是无限的支配权作为交换条件的,因此他们不会对政府持任何反对意见。^①

随着维也纳作为行政、金融、商业和制造业中心的快速发展,下奥地利的各阶层进一步要求废除最后剩余的封建义务,以及采取措施消除贫困。^② 19世纪40年代的经济问题日益严重,手工业者无法承受来自机械化生产的竞争而大量破产,1847年的饥荒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问题,农奴对封建特权的反抗也越发强烈,而梅特涅政府却通过向俄国贷款来压制民众的抗争。^③ 法国二月革命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东欧,由于通信的进步以及三次法国革命的榜样作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大众的民族主义原则引领着各地的起义。^④ 匈牙利议员拉约什·科苏特(Lajos Kossuth)在议会的演说中提出匈牙利的民族独立诉求以及要求帝国各个部分都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其演说手稿被迅速传播到维也纳,从而拉开了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革命的序幕。^⑤ 维也纳的资产阶级和文化协会成为推动革命的重要力量,3月13日在下奥地利召开的帝国等级会议为这种斗争提供了场所,学生、中上阶层的成员和中下阶层的代表在会议开始前集合,并向议会提交请愿书,要求进行君主立宪改革并罢免梅特涅。^⑥ 最初,维也纳的变革非常顺利,在发生轻微冲突后,王室在当天下午接受了示威人士的多数要求,梅特涅则在当晚流亡国外。早期革命的意外顺利也让奥地利出现了广泛的乐观主义倾向,与此同时,波希米亚、加里西亚和匈牙利等地的民族运动也夹杂在革命中,使得民主主义原则与民族主义原则发生冲突。维也纳的革命者积极支持帝国军队镇压米兰和布拉格的革命,将此视为对抗外国人的爱国主义大捷,但在皮埃蒙特和波希米亚的军队被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9页。

② Roger Price,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p.28.

③ Oscar Jaszi, *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pp.89-87.

④ [奥]史蒂芬·贝莱尔:《奥地利史》,黄艳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页。

⑤ Mike Rapport, *1848: Year of Revolution*, pp.60-61.

⑥ Wolfram Siemann,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848-49*, Palgrave Macmillan, 1985, p.61.

败后,帝国军队就开始对革命者控制的维也纳发动攻击,最终维也纳的革命也在1848年10月被镇压。^①

为了巩固其反革命的成果,并推翻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所做的过多让步,哈布斯堡王室不惜改变其继承规则,劝说斐迪南一世逊位,改由其侄子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继位。^②新皇继位后,1849年5月奥军在匈牙利遭遇惨败,约瑟夫一世在危急之中只能求助于“神圣同盟”,以极为恭顺的态度请求俄国的援军。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担心革命会波及俄国的势力范围,遂派遣20万大军入侵匈牙利,俄军在人数和装备上都具有压倒性优势,在其帮助之下,奥地利在1849年8月镇压了匈牙利起义。^③

约瑟夫一世皇帝于1849年3月4日颁布首部帝国宪法,但在成功镇压革命之后又于1851年再度废除宪法。局势稳定之后,约瑟夫一世解散了民选议会,强制推行了一套新绝对主义官僚制度。为了巩固革命后的局势和安抚镇压后的不满情绪,奥地利王室开始了政治现代化变革。此后,奥地利的变革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它强化了国王的官僚专制主义,将维也纳的意志推广到帝国各处,将其变为一个绝对权力的国家;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其专制主义的权力,奥地利借助扩张推动了许多约瑟夫二世(Joseph II)在18世纪末所未能够完成的改革。^④作为对革命的必要回应,哈布斯堡帝国仍然从改革派的价值观中接受了许多革命的遗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废除农奴制。哈布斯堡王室正式宣布了农奴的解放,而地主获得了相应的经济补偿,同时也不用再承担实施政府职责所需的行政和司法费用。^⑤与此同时,约瑟夫一世的新帝国废除了封建制度的残余,在乡村地区最终确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停止了行会的特权,进行大学教育改革,并且确认产权、迁移和择业的自由,强调法律面前的公民平等。^⑥奥地利的现代化改革较为顺利,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梅特涅时期奥地利国家能力的增强。这同德意志其他地区(尤其是普鲁士)有着巨大的差异,19世纪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垄断了地方行政统治权,形成了同官僚君主制的紧密联盟。^⑦因此这种结构性差异带来的结

^① Pieter M. Judson, *The Habsburg Empire: A New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215-217.

^② Daniel L. Unowsky, *The Pomp and Politics of Patriotism: Imperial Celebrations in Habsburg Austria, 1848-1916*,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7.

^③ [法]理查德·埃文斯:《角逐权力:1815-1914》,第267-268页。

^④ 18世纪奥地利改革的详细叙述,参见叶成城:《第一波半现代化之“帝国的胎动”——18世纪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崛起之路》,第126-154页。

^⑤ David F. Good, *The Economic Rise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750-191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78.

^⑥ Pieter M. Judson, *The Habsburg Empire: A New History*, pp.218-220.

^⑦ [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何俊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178页。

果是1848年之后奥地利的政治变得更为开明,而普鲁士则更加趋于保守,直至走向长期的对外扩张之路。

(三)变革模式 A+B:丹麦

19世纪30年代以来,丹麦出现了爱国团体、政治俱乐部、宗教及农业协会等大量社会组织,广泛地培养了大众的政治意识,而1834年设立的省级三级会议创建了一个反对派可以阐述其政治主张的舞台。^①1847年,国际经济危机和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加剧了人们的不满,与外部威胁一起共同推动了丹麦的现代化改革。同时,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和荷尔斯泰因(Holstein)两大公国是维也纳会议后成立的松散的“德意志联邦(Deutscher Bund)”的一部分,传统上与德国关系更近。它们存在日益强烈的分离主义倾向,因此与丹麦君主制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这两个公国因受到法国革命的影响要求制定自由宪法,同时并入德意志联邦,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Frederik VII)拒绝了这些要求。由于害怕失去石勒苏益格,哥本哈根的自由派公民采取联合行动,在1848年3月20日举行群众大会,要求罢免不值得信赖的大臣以及向自由宪法过渡。^②因此,丹麦的1848年变革同样是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结合。反对派中一部分人关注国家统一胜过宪法问题,另一部分人则倡导激进的立宪主义,主张男性普选权,而温和的民族自由主义者通过联合坚持王朝继承下的民族团结和对民主运动的宪法让步,为自己赢得了核心地位。^③在温和改良派的影响下,丹麦主动推行了改革,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自由宪法问题导致两个地区的独立;另一方面则通过推行征兵制以应对德国的威胁,而引入征兵制度又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它奠定了现代公民制度的基础,最终使得资产阶级掌握了权力。^④

1848年哥本哈根的改革诉求没有像巴黎、柏林或维也纳那样导致流血事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丹麦军队的资产阶级化和贵族影响力长期下降。丹麦王室自1660年以来对中央集权制进行改革,为降低贵族的影响力而培养了一支相对非贵族化的军官队伍,其社会基础是军官后代、资产阶级和文职官员的后代。到19世纪40年代,反对派已经在炮兵军官、军官学校和总参谋部等职位中占据主导地位,一些军官

^① Flemming Mikkelsen, "Denmark 1700-1849: Crowds, Movements and Absolute Monarchy," in Flemming Mikkelsen, Knut Kjeldstadli and Stefan Nyzell, eds., *Popular Struggle and Democracy in Scandinavia: 1700-Present*,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p.28-29.

^② [丹]克努特·J.V.耶斯佩森:《丹麦史》,李明、张晓华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5-56页。

^③ Bertel Nygaard, "Hegelianism in Politics: Denmark 1830-48," *Intellectual History Review*, Vol.19, No.3, 2009, pp.306-307.

^④ Lars Bo Kaspersen, "How Denmark Became Democratic: The Impact of Warfare and Military Reforms," *Acta Sociologica*, Vol.47, No.1, 2004, pp.82-86.

也积极投身于 1848 年的各类自由主义运动当中。^① 而强国家的传统仍然给丹麦国王保留了很多权力,尤其是任免大臣的行政权,因此,国王几乎未做任何抵抗就接受了全部要求。1849 年 6 月,国王批准了新的民主宪法,最终确立了现代丹麦民主制度的基石:在大众层面,30 岁以上符合一定财产条件的男子享有选举权,大约 15% 的人获得了选举权;在精英层面,由两个议院组成的议会拥有立法权和财政权,并有权审查大臣们在政府会议上的行为。^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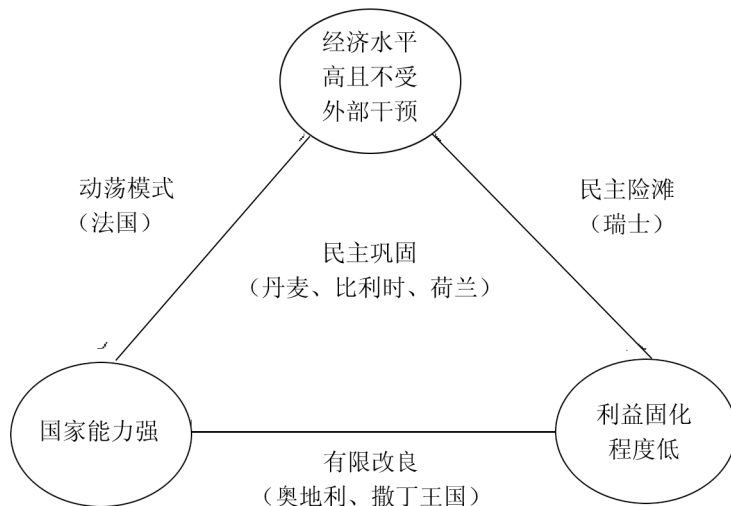
(四)小结

上述三个模式的过程追踪仍然是基于正面案例的讨论。如图 2 所示,涉及了三种不同模式下欧洲国家在 1848 年成功实施变革的方式。变革模式 A 展现的是外部冲击后出现强烈的互动与共鸣,国家在具有较强的经济基础且不受反革命联盟干扰时,能够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式来推动政治现代化,以瑞士和法国为代表,但诸如瑞典、芬兰等国则缺乏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基础来推动变革,而像萨克森、巴伐利亚以及北意大利诸邦(摩德纳、帕尔马和托斯卡纳)则受到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国的干扰或镇压而最终失败。变革模式 B 展现的是在受到外部冲击后,欧洲国家内部出现社会动员与抗争,最终迫使王室主动通过改革来推动现代化,诸如普鲁士、西班牙、教皇国和两西西里等国由于存在严重的利益固化而使得这种抗争被迅速压制,最终只有奥地利和撒丁王国部分推动了政治现代化。变革模式 A+B 展现的是两种路径都存在的“超级案例”,如丹麦、比利时与荷兰,一方面具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在几乎不发生革命的情况下由王室主动立宪来推动政治民主化。

^① Gunner Lind, “Military and Absolutism: The Army Officers of Denmark-Norway as a Social Group and Political Factor, 1660-1848,”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 Vol.12, No.3, 1987, pp.221-243.

^② See Byron J. Nordstrom, *Scandinavia Since 1500*,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p.214-215.

图2 1848年变革:民主化的因素与不同模式



注:图由作者自制。

此外,通过对出现负面结果的案例进行观察可以看到,1848年欧洲的制度变迁迅速且剧烈、呈现多元化的路径、长期来看多数以失败告终,这些看似不相关的问题却存在共同的原因,即“帝国的共鸣”。1848年前后的信息传播和人员流动速度的大幅增长,同时又伴随着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变革理念的出现,致使国家之间无论在结构还是过程层面,无论在物质还是观念层面都存在过去从未有过的互动与共鸣。它不同于传统的扩散模型之处,不仅在于时间的先后,还有强烈的反馈效应:如瑞士和意大利的变革为法国、奥地利和德国的抗争提供了示范,后者又反过来影响到前者的进程,例如德国的革命减少了普鲁士对瑞士的干预。外部联系强大时,民主浪潮的力量可以压倒国内条件,并通过蔓延的方式进行传播。^①在“帝国的共鸣”之下,1848年革命的浪潮让欧洲国家从多元化而非单一的路径获得“现代化的入场券”,例如不仅仅依靠第一波现代化中几乎必须进行的强国家和弱利益集团的组合,从而使一些欧洲国家能够以更快的速度与更多元的途径实现政治现代化。但在国际大形势下推动的现代化进程也容易带来更剧烈的动荡,即在充满浪漫主义变革的国际环境下,容易高估革命胜利的可能性而忽略经济社会基础,例如在哈布斯堡帝国和德意志地区的抗争最终都

^① Seva Gunitsky, “Democratic Wav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641.

被保守力量各个击破。因此,1848年革命迅速发生和失败的部分原因是一致的,即认知不足,仅看到部分地区的革命较为顺利就做出了轻率的估计,仓促决策的过程也决定了这些革命容易以失败告终。^①

五 结论

前文讨论了1848年前后影响欧洲各国政治现代化的因素和机制,以及这些变量所对应的三种不同的变革模式。但这些仍然是基于短期观察所得出的结论,还需要从中长时段来查看国家的发展,从而更好地理解1848年欧洲变革的长期影响。如图2所示,可以将上述变量简化为三个,即是否为经济水平高且不受外部干预(近似于是否存在资产阶级革命)、国家能力和利益固化程度,并根据是否满足这三个条件来进一步将这些正面案例细分为四种模式,从而看到任何单一因素的缺失对于国家长期发展都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负面效应。^②首先,强国家和高度利益固化下的资产阶级革命,最为典型的是法国。尽管法国的二月革命迅速成功,但始终无法解决大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矛盾,临时政府也从未试图清算金融资本家,致使工人阶级的六月起义被强大的国家机器所镇压。这一镇压又导致了改革派内部的分裂,最终在各方势力互相掣肘的情况下,民众只能选择最不受党派纷争影响的拿破仑三世。^③这种组合意味着强烈的社会动荡,因为强大的利益集团容易与试图进行改革的强政府发生激烈冲突,有过1789年前车之鉴的法国并未吸取教训。^④1789年和1848年两次变革都导致剧烈的动荡,并且最终都走向了“拿破仑”的帝制,对于这种“历史的重演”,马克思评论道:“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⑤其次,利益固化程度较低但是缺乏有效国家能力的资产阶级革命,其典型案例是瑞士。瑞士代表的是一种特例,它在1830-1847年建立联邦的过程中,国家一直处于永久性分裂的风险中,幸运地在1848年的“帝国的共鸣”中推进了国家建设,长期通过坚持“永久中立”的外交原则在大国夹缝中谋求发展。蒂利对瑞士的这种特殊模式进行过总结:如果受保护协商机制(protected consultation)先于、快于国家能力出现,而政体得以存续,那么民主之路

^① Kurt Weyland, “The Diffusion of Revolution: ‘1848’ i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pp.391-423.

^② 在三角形中间代表具备所有条件,而在其中一条边上的模式则意味着缺少相对顶点的条件,图2的画法参考了国际经济学中的“三元悖论”。

^③ See Roger Price, *The French Second Republic: A Social History*, pp.213-217.

^④ 这一组合导致了18世纪后期法国的社会动荡,参见叶成城、唐世平:《第一波半现代化之“帝国的黄昏”——法国与西班牙的改革之殇》,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3期,第122-15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68页。

就要途经一个政府能力建设的险滩。^①再次,缺乏资产阶级革命背景下的强国家和利益固化程度低的组合,其典型案例是奥地利和撒丁王国。这两个国家具备了自上而下改革的条件,但是缺乏阶级革命的压力使其仅仅进行了有限的改良,也为此后的奥地利和意大利的民主化转型带来了巨大的障碍。最后,具备全部条件的国家,即丹麦、比利时与荷兰,它们在1848年后保持长期的制度稳定与繁荣,迄今仍是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

1848年变革的另一个特征是,民众权利意识强化的同时也伴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因此有学者称之为“民族之春”。^②1848年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矛盾在此期间未曾得到有效解决,前者重视民族统一而后者则倾向于强调主权在民的原则,这两种思潮并非总是一致的。主权原则和民族自决原则的意识形态交锋孕育出当代秩序。^③一方面,诸多相邻的单一民族国家或地区存在统一的动力,但民族国家的统一并不符合均势原则指导下的大国利益,故而时常成为国际冲突的根源。1848年撒丁王国统一意大利的尝试和普鲁士建立德意志联邦的企图均未能成功,而此后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问题成为19世纪后半叶欧洲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④另一方面,多民族国家的部分地区在民族自决原则下存在强烈的分离主义倾向,它们要么试图加入现有大国,要么试图成为独立国家,这些都与19世纪的主权以及均势原则存在冲突。例如,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直至消亡都无法解决匈牙利等地区的分离主义问题,即便现代化较为成功的荷兰也同样面临卢森堡问题,丹麦则因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问题最终与德国爆发灾难性的战争。^⑤而多民族帝国的国家建设问题为此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国家现代化留下巨大的隐患,也是1848年欧洲变革之后“第二波半现代化”研究的重要议题。^⑥

(作者简介:叶成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责任编辑:齐天骄)

^① Charles Tilly, *Contention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1650-2000*, pp.198-199.

^② Seva Gunitsky, "Democratic Wav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p.634-651.

^③ [英]詹姆斯·梅奥:《民族主义与国际社会》,王光忠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④ 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进程的论述,参见 Daniel Ziblatt, *Structuring the State: The Formation of Italy and Germany and the Puzzle of Federalism*.

^⑤ 相关讨论参见[英]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年》,沈苏儒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12章。

^⑥ 参见王子夔:《普鲁士歧路——19世纪俄国和奥地利现代化改革中的效仿》,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0期,第105-128页。